

中国古代史卷

浙大史学精粹

卢向前 主编

陶磊 陈健梅 卢向前 王春红 陈志坚 陆敏珍 吴铮强 鲍永军 杜正贞 吴艳红 孙竞昊 杨雨蕾 楼毅生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Zhe da Shi xue Jing cui

中国古代史卷

浙大史学精粹

卢向前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大史学精粹. 中国古代史卷 / 卢向前主编.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308-12469-0

I. ①浙… II. ①卢…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文集
IV. ①K0—53 ②K2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0569 号

浙大史学精粹——中国古代史卷

卢向前 主编

责任编辑 胡 畔(lpp_lp@163.com)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80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469-0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cs.tmall.com>

检视 · 总结 · 再出发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2011 年底前在职教师的研究论文精选集粹。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源远流长,其前身是 1928 年 8 月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创设的史学与政治学系(1936 年改称“史地系”)。建系以来,有一批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张荫麟、陈乐素、谭其骧、向达、贺昌群、刘节、沈炼之、钱穆、方豪、张其昀、谷顾宜等先后在此执教,为历史学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高校院系调整,使浙江大学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体的学校,杭州大学历史系遂执浙江历史学科之牛耳,其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地方高校前列,涌现出一批优势学科与知名学者。

中国古代史学科 1978 年获硕士点,1986 年获博士点,包括宋史、隋唐史、中西关系史、史学史以及中国历史地理等研究方向。宋史研究始终处于国内学术界的前列,为南方的宋史研究中心,先后有陈乐素、徐规、梁太济、杨渭生、龚延明、何忠礼、包伟民等学者,其中有五人担任过宋史研究会副会长。黄时鉴的元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影响很大,成果获教育部优秀成果二等奖。仓修良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资深副会长,在史学史研究、方志学研究方面享有盛誉。孙达人的农民史研究、李凭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卢向前的隋唐史研究、倪士毅的浙江古代史研究、李志庭及阙维民的历史地理研究,均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 1982 年获硕士点,1993 年获博士点。其中郑云

山、汪林茂、郭世佑等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在浙江近代地方史、辛亥革命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金普森对于中国现代史、经济史(内外债)方面的研究,杨树标关于中华民国史、蒋介石、当代台湾史的研究,均具有较大影响,在史学界居领先地位。

世界史学科 1979 年获硕士点。世界地区国别史方面的法国史和德国史在国内史学界享有盛誉,其中法国史的研究实力雄厚,先后有沈炼之、楼均信、戴成均、郑德弟、沈坚、吕一民等学者,其中多人担任过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和秘书长,是国内有名的法国史研究中心之一。在德国史研究方面,丁建弘担任过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世界史前史研究在国内独树一帜,毛昭晰为这方面的知名专家,龚缨晏的研究也得到古代史学界的认可。王正平在史学理论研究、王瀚明在欧洲人口史研究、杨杰在英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为史学界所公认。

1998 年,四校合并,以杭州大学历史系为主体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科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从 1928 年算起,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已走过 80 余年的历程,其间有春风得意的顺境,也有艰难曲折的逆境。然而,历史学系的教师们始终坚守学术本位,辛勤耕耘,教书育人,努力钻研,使历史学系形成了务实创新的鲜明特色。1994 年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2005 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下属的各二级学科均有博士授予权)和五个硕士点,并设有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多年来为国家培育了大量史学研究的高级人才与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

目前,历史学系师资队伍精干,现有的 33 位专任教师均毕业于国内外名牌大学,不少人具有在国外著名高校或科研机构访问、进修的经历。本系教师的国际交流活动频繁,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成果丰富,不仅承担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在内的多项科研项目,而且不少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获得了国家及省部级奖励。

中国史(包含古代史、近现代史)是浙江省重点学科。浙江大学是国内获得中国古代史博士点较早的高校,宋史、隋唐史、中西关系史以及中国历史地理等研究方向为本系的传统重点。尤其是本系学者利用地处杭

州的区位优势,长期以来在宋史研究方面辛勤耕耘,拥有雄厚的研究实力,培育出了一大批优秀成果及研究人才,在全国处于同类研究的前列。近年来,中国古代史方向的教师在保持传统优势项目的基础之上,又从海外引进人才,开拓出江南区域明清史的新研究方向,组成创新团队,成果可期。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点主要包括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研究方向。在中国近代史方向,侧重于近代浙江社会的转型、学术史的研究。民国史研究方向,近年来,集中科研力量研究蒋介石及其与近代中国的关联课题,建立了国内唯一以蒋介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成为本学科点的优势特色之一。该中心成功举办了大陆地区第一次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向,以浙江省为基点,主要着眼于当代中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乡村社会变迁史等方面的研究。最近,历史学系又利用所收集的珍稀地方史料,建立了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将致力于对保存完整的晚清至民国期间司法档案进行综合研究,成果将陆续问世。此外,我们还有其他基于第一手资料的新增长点:五万卷绍兴商会档案的整理工作也已着手进行;知名美籍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女士已将其全部中文档案捐献给浙江大学。

世界史获一级学科博士点,也是浙江省重点学科,主要包括法国史、美国史、日本史等研究方向。其中,法国史的研究始终是本学科的传统重点,研究实力雄厚,是国内有名的法国史研究中心之一。近年来,在法国近现代史方面,研究成果尤为显著。随着人才的引进,美国对外关系史、东亚区域史、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方向,成为世界史新的增长点。

为检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特意选编了这套《浙大史学精粹》,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三册,收入老师们近年来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这套论文集虽然不够全面,但可以“管中窥豹”,它能展示最近十年来历史学系老师们的关注重点与努力方向,看到他们是如何在保持传统优势学科的基础之上,不断与时俱进,发掘新史料、运用新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

我们也正好利用编辑出版论文集,展示成果的机会,对历史学系近年来的科研做一个整体的检视,总结经验教训,砥砺前行,作为未来发展的坚强基石。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相信,依靠全系教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辅以学校有关繁荣人文社会科学措施,浙江大学历史学系重振雄风、人才辈出、重大成果层出不穷的辉煌时刻,定在不远。

前 言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有着光辉的传统,自 20 世纪 30 年代成立史地系起,先后有张荫麟、谭其骧、钱穆、张其昀等先生执教此间,在海内外史学界有着相当影响。而在“文革”以后的一长段时间内,徐规、倪士毅、梁太济、仓修良、黄时鉴、杨渭生、何忠礼等先生,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史学科已建设成为具有优良的教学科研设施、充分而有特色的图书资料、人才培养和国际学术交流基地的优势学科,特别是隋唐五代史、宋史、江南地方史领域具有相当影响力并形成科学研究团队,培养出一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并在浙江省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新兴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又为本学科添注了极大的活力。

本学科的学科队伍年龄结构合理,学术素质上乘,学术水平处于前沿,研究人员队伍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本学科在职的成员共 12 人,11 人具有博士学位;而从层次来说,教授 3 人、副教授 9 人。本学科引进海归博士 2 人(其中 1 人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引进“211 工程”学校副教授 1 人,他们充满活力,视野开阔,具有极强的研究能力,且学术交往遍及世界各地,对于本学科以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本学科的学科分布亦颇为合理,而在国际国内高级论坛中能占有一席之地的就有先秦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历史地理学、专门史,而新兴的地方文献整理、江南地方史研究必将成为本学科崭新的学术增长点。

本学科的教学工作新开设了涵盖整个历史学科博士教学的核心课程“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为本学科研究生开设的“中国古代史最新成果简介”、“中国古代史专题研讨”等。学校核心课程“中国历史专题”,颇具特色,本学科的双语教学由于海归教授的加盟,锦上添花。研究生培养中还

有日本的留学生、进修生,韩国的留学生,中国台湾地区的博士生等。

本学科的科研成果颇为骄人。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共出版专著30部、译著3部、教材8部。专著中,有1部获国家级奖励、6部获省部级奖励。发表论文300篇,其中有46篇发表于一二级杂志,一些论文或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或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引用摘录,亦有见于如《光明日报》的评论文章中,足以彰显这些文章的价值。

本学科的优势还体现在学科的交叉上。文书与文献的结合,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的结合等,都做得相当成功。比如敦煌学与隋唐史、简牍与先秦秦汉史、江南史地方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等等。

本学科还积极开展对外交流,走出去,请进来,出国或到台湾、香港地区交流讲学的学者大有其人,而国际一流学者的造访亦甚频繁。

本学科还积极与地方、企业合作,为普及史学知识、宣扬人文精神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比如,本学科与龙泉档案馆合作,共同整理民国时期龙泉刑事民事案卷,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经济效益,还为地方的文化建设出了力,一举而三得,发挥了本学科的固有优势,而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浙江大学地方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已成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不可替代的新的优势学科。而中心整合现有力量,组建江南区域史研究团队,作为浙江省重点文化创新团队,必将为本学科的发展壮大贡献力量。

浙江大学历史系颇为重视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为展现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风采,经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商讨,遂将本学科的一些科研成果集结成册,附以各位教师的简介与照片,一并刊布。它既是既往成绩的展示,又是新起点的开始,让我们期待着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的长足进步吧。

卢向前

2012年2月9日

目 录

代 序 陈红民	001
前 言 卢向前	001
明堂考论:以上古宗教、宇宙论的变迁为背景 陶 磊	003
从政区建置看曹操的经国方略 陈健梅	027
从政区建置看三国时期川江沿线的攻防策略 陈健梅	046
光极堂大选与品令 卢向前 王春红	069
武则天“畏猫说”与隋室“猫鬼之狱” 卢向前	083
隋代杭州州城考论 陈志坚	105
唐代的直属州研究 陈志坚	126
宋学初兴与唐宋时期的师道运动 陆敏珍	147
宋代地方志编纂中的“地方”书写 陆敏珍	172
北宋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 吴铮强	189
高似孙生平事迹考辨 鲍永军	211
地方传统的建构与文化转向:以宋金元时期的山西泽州为中心 杜正贞	225
明代流刑考 吴艳红	261
经营地方:郑与侨与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 孙竞昊	281
盐铁会议的歧义与缺憾:兼论中国古代商人资本的性质和历史作用 孙竞昊	315
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 杨雨蕾	337
明清交替前后朝鲜华夷观的形态及其变化 杨雨蕾	352
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 楼毅生	373

陶 磊



陶磊,1972年生,江苏盐城人。苏州大学历史系本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博士。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曾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上古历史、思想与文化。

著有《〈淮南子·天文〉研究:从数术史的角度》(齐鲁书社,2003年)、《从巫术到数术:上古信仰的历史嬗变》(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思孟之间儒学与早期易学史新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巫统、血统与古帝传说》(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斯文及其转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代表性论文有《晋侯苏钟和月相四分法》等。

明堂考论:以上古宗教、宇宙论的变迁为背景

绪 论

近人王国维有云:“古制中之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①诚哉斯言。明堂之难议者,据清人金鹗归纳,有三点:一是明堂所处之位置,有国中国外之说,国外又有三里与七里之分;二是明堂制度之难求,或以为五室,或以为九室,或又以为一室;三是明堂与辟雍、灵台、大庙之关系。^②旧时代的学者,围绕这些问题,可谓言人人殊。^③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然终因视野、材料所限,所定上古明堂之是非,终不能令人信服。

近五十年来,明堂制度的研究,主要围绕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展开,而以明堂形制为焦点。概括起来,新近的讨论大致有这样几方面:一是由殷代“亚”形大墓,以及铜器铭文中的“亚”形图案引发的讨论;^④一是由新石器考古发现的所谓“大房子”引发的思考;^⑤一是由西安郊区汉代建筑遗址的发现引发的讨论;^⑥一是由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墓出土的圆形

① 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观堂集林》卷3,中华书局,1959年。

② 金鹗:《明堂考》,《求古录礼说》卷2,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

③ 有关讨论可参见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的相关研究。

④ 曹春平:《明堂发微》,台湾《建筑学报》第9期(1994年冬季号),第65—84页;黄铭崇(Hwang, Ming-chong):“Ming-Tang: Cosmology, Political Order and Monuments in Early China”,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第119—142页。

⑤ 汪宁生:《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第271—294页;汪宁生:《释明堂》,《文物》1989年第9期,第20—24页;杨鸿勋:《明堂泛论——明堂的考古学研究》,《[日]《东方学报》(京都)70册,1998年,第1—94页。

⑥ 许道龄、刘致平:《关于西安西郊发现的汉代建筑遗址是明堂或辟雍的讨论》,《考古》1959年第4期,第193—196页;王世仁:《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大土门村遗址)原状的推测》,《考古》1963年第9期,第501—515页;王世仁:《明堂形制初探》,《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1页。

漆器图案,以及与其相关联的长沙楚帛书所引发的讨论。^①就上古及三代明堂而言,所得结论,以倾向于承认明堂为“亚”形建筑者居多,近年的研究以黄铭崇先生为代表。^②反对明堂为“亚”形建筑者,以汪宁生先生为代表。^③以研究建筑考古学名世的杨鸿勋先生则主张,从黄帝开始的明堂为一室,以后渐渐发生变化,他认为周人已是五室明堂,而此制度是从殷人的“重屋”演变而来的。^④

平心而论,尽管既往学人对明堂制度已有很多讨论,累积了大量文献,但要据以判定上古明堂的具体形制是五室还是九室,仍很困难。记载两种明堂制度的文献都是东周以后的,不足以说明西周或更早的明堂制度。先秦文献中唯一的明堂实例见于《孟子》,顾颉刚先生已指出,这个明堂实际就是太室。^⑤西汉武帝欲造明堂,无人知道具体的明堂制度,齐人公玉带献黄帝时明堂图,所绘为一室明堂。^⑥《孝经援神契》云:“明堂之制,东西九筵,筵长九尺也。明堂东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谓之太室。”^⑦至唐代,还有人认为明堂只有一室。^⑧则明堂不必非五室即九室。

就借助于考古材料探讨上古明堂制度而论,所谓商及西周存在“亚”形明堂之说,虽有不少证据的支持,但终究缺乏直接的地面建筑的考古证据。力主“亚”形建制实际就是宗庙明堂建筑的象征的高去寻先生,就曾引此为憾事。^⑨杨鸿勋先生对其所论明堂,均有复原,且多有考古发现为其基础,唯对周人五室明堂的复原缺乏考古依据,而其对殷人“重屋”的复原又非五室。至于临淄郎家庄东周漆器图案,只能证明东周已存在四合院式之建筑,但并不足以证明西周明堂已具此形制,更不能说,漆器图案

① 前揭黄铭崇博士论文第二章第三、四节,第61—85页。

② 前揭黄铭崇博士论文。

③ 汪宁生:《释明堂》,《文物》1989年第9期,第20—24页。

④ 前揭杨文。

⑤ 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卷3“明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⑥ 《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均有记载。

⑦ 《太平御览》卷533引,中华书局,1960年。

⑧ 成伯玙:《礼记外传》,《太平御览》卷533引,中华书局,1960年。

⑨ 高去寻:《殷代大墓的木室及其涵义的推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本《庆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1969年,第175—194页。

本身反映的就是明堂建筑。如果考虑到关于明堂的功能的争论,将考古材料直接拿来论证明堂的形制,其结论的可靠性,更要大打折扣。总之,目前的研究尚不足以确定上古明堂的具体形制。

就研究思路而言,对于上古历史文化的研究,笔者认为,解释其在演变传承过程中分歧的产生,比确定其间之是非,也许更有意义。明堂无论是一室还是五室或九室,无论是在实践中曾经使用过,还是仅仅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它们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确定是非即所谓考证固然是历史研究,理解它们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或者说,将明堂演变在宗教、文化诸方面的背景阐释清楚,也是历史研究。事实上,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分歧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是非本身也难以确定。有人会说,事实不清楚,怎么可能弄清它的背景。这个发问固然有可取之处,但我们知道,历史文化现象从发生的角度讲,有本源与派生的区别,有一些现象属于派生文化。就明堂制度而论,它的本源是上古宗教、宇宙论的思想,而制度上所谓五室与九室之分都是从此本源派生出来的。如果没有关于上古宗教、宇宙论思想的整体把握,试图单刀直入,考证上古明堂的真实,恐怕很难令人信服。过去的学者对于明堂制度争论了两千年,都是在制度的层面上打圈圈;现代学者虽然有了考古材料的助益,但也没有能超越这个层面。这对于宗教建筑的研究来说,显然没有能抓住问题的本质。^①本文的工作,就是要将上古宗教、宇宙论的变迁,与明堂制度上的争论结合起来,从而理清明堂制度争论的由来。事实上,在东周以上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上古宗教、宇宙论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之相应的明堂制度也应有极大的变化,否则,东周时代的人怎么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认识呢?因此,即使要考证上古的明堂制度,也只能考证某一特定时段内的制度,而不可能说上古明堂只有一种制度。

十多年前,笔者因受李学勤先生诸篇文字的激发,撰《〈太一生水〉与

^① 黄铭崇的工作是从宇宙论的角度切入的,但其对于上古宇宙论变迁的认识不深,无法合理解释明堂上的种种争论的来历,仍是一种定是非的思路。

明堂制度》，^①将后人有关明堂制度的论说与宇宙论挂钩，认为五室与九室明堂的分歧，源于太一成岁的两种不同模式，一为四时成岁，一为八节成岁。现在看来，这样理解还不够，五室与九室的不同，实际上反映的是宇宙论中方、圆的分离，而这可以进一步向前追溯。而在这种以宗教、宇宙论变迁为背景的追溯中，既往学人关于明堂的诸多争论，都可以得到合理的定位，每一种说法都有其来历，基本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新论可信与否，不敢自以为必，故略采旧文，合以新得，撰成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 方、圆之分与五室、九室之别

明堂五室与九室之争始于东汉，其时有所谓今礼、古礼之别，许慎《五经异义》云：

今《戴礼说·盛德记》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所以朝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说》：“明堂高三丈，东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圆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户八牖，其官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讲学大夫淳于登说云：“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就阳位，上圆下方，八窗四闑，布政之官，故称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礼》、《孝经说》：“明堂，文王之庙，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盖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于明堂，以昭事上帝。”许君谨按：“今礼、古礼各以义说，无明文以知之。”^②

所谓“今礼”是指东汉的明堂制度，《礼图》云：“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

^① 见简帛研究网 www.bamboosilk.org, 2001年7月28日。该网站地址已改为 www.jianbo.org。

^② 孔颖达：《礼记正义·明堂位》引，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

圆下方，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①此制最早见于《大戴礼记·盛德》（今本在《明堂》篇）。所谓“古礼”是指《周礼·考工记》所载之五室明堂之制。

郑玄对于许慎所认为的两种明堂制度“无明文以知之”加以反驳，他说：

《戴礼》所云，虽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秦相吕不韦作《春秋》时说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误，本书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义于《孝经援神契》，说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闑，布政之官，在国之阳。帝者，谛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实在太微，在辰为巳，是以登云然。今汉立明堂于丙巳，由此为之。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施行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炳然，本制著存，而言无明文，欲复何责？^②

按照郑玄的说法，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则五室之制早于九室。

笔者认为，明堂五室与九室的区别，另有其意义。如前所论，所谓九室明堂，其文献基础为今本《大戴礼记·明堂》。《明堂》篇中，有“赤缀户也，白缀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的记述。清代学者曾指出，文中“赤缀户，白缀牖”的赤与白，是明堂图上的颜色标识，是论可信。笔者认为，其后面的九个数字，即所谓九宫幻方，也当是九室明堂图的基本形式的反映。

后人图示九宫，多将其画为方形，但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九宫图，却是圆形。1977年7月，安徽阜阳罗庄大队的汉初汝阴侯墓中发现一件太一九宫占盘^③，李学勤先生名之为九宫式盘^④。式盘由上下两盘组成，下盘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84页。

② 此据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清经解》卷1249，上海书店，1988年。

③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第12—31页。

④ 李学勤：《〈九宫八风〉及九宫式盘》，原载《王玉哲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入李著《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35—243页。